

# 经济是否存在国别集聚

——来自外资企业地址的证据\*

马野青 秦相慧 逯建

**内容提要:**集聚地之外的因素是否会对经济的集聚产生影响?同一城市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存在国别集聚?本文基于1992—2018年区分来源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华注册数据,探究了国别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在城市内部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城市内部选址时存在向同一来源国已有投资靠近的倾向,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同时还发现外资企业邻国集聚现象在城市内部存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家发展水平更低、投资规模更小和投资于我国东部城市的外资,邻国集聚倾向更高。机制分析表明,国别集聚通过缓解竞争劣势、构建社会网络和合法性外溢等方式影响新进外资的选址。最后,本文还发现区域政策和产业因素均不影响同源国外资分布,而邻国集聚则可能与产业关联相关。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国别集聚

**作者简介:**马野青,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210093;

秦相慧(通讯作者),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210093;

逯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210093。

**中图分类号:**F27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5)01-0169-16

## 一、引言

自屠能1826年提出农业生产布局理论以来,有关经济活动空间集聚驱动力的来源问题就一直被学术界广泛探讨。经济集聚固然来自经济主体本身的地理优势,如更多的资源产出(Ellison和Glaeser,1999)、更便利的交通条件(Krugman,1991)等;也有可能来自产业链的协作关系,如上下游企业的协作关系(Henderson,1997)、对中间品投入的共享(Rosenthal和Strange,2001);更有可能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开放发展与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研究”(22JJD790035)。作者感谢2022年建构中国自主的应用经济学知识体系青年论坛、中国世界经济学会2023年年会暨中青年论坛与会学者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秦相慧电子邮箱:xianghuiqin0816@163.com。

来自经济社会的空间外部性,如城市人口共享科研知识的溢出(Saxenian, 1994),城市的劳动者共享就业工作机会(Audretsch和Feldman, 1996; Arauzo Carod, 2005)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导致经济集聚最主要的“向心力”。

以上经济集聚的原因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导致经济集聚的向心力仅来自经济集聚的本地。而对于与外地存在紧密联系的经济体(比如外商投资企业),是否可能会有集聚地以外的因素对经济的集聚产生影响?美国各州已有的某行业日本企业的集聚会显著增加后来同行业外资进入的概率(Head等, 1995)。Head和Ries(1996)在垄断竞争的基础上对早期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研究,发现早期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存在明显的“自我强化”现象:外资进入中国时会优先选择已有外资较多的地区,之前已有外资企业的选址会显著影响新进外资的区位选择,国内也有学者发现我国各城市内已有外资的集聚会提升该城市对后续外资的吸引力(冯涛等, 2008)。外资企业的投资来源地联系程度,会因投资关系对东道国的经济空间联系产生影响,例如青岛市内分布着数量庞大的韩资企业,德资企业多在太仓市集聚,而日资企业则偏好在佛山与大连等城市落户。He(2003)通过分析中国制造业外资的分布情况,首次提出“来源国集聚效应”(Country of Origin Effects),即同一来源国已有外资的高度集聚会吸引更多同国外资企业进入该地区,来源于外部的国别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资企业的空间选址(徐康宁、王剑, 2006; 颜银根, 201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性(盛丹、张国峰, 2019),已有研究中关于本土企业集聚的成因无法完全解释外资为什么会在东道国空间集聚。外资在东道国选址时可能更加注重信息外溢与知识扩散等条件(Head等, 1995; Shaver和Flyer, 2000),因为海外投资的成本相对更高,外资企业的选址决策显得尤为重要,而邻近的企业集群则会产生信息外溢。企业可以通过周边邻居获取投资和出口等市场信号(Foster和Rosenzweig, 2010; Fernandes和Tang, 2014; 陈榕景、铁瑛, 2022),因此外资企业可能出于甄别目的地情报(Head等, 1999)、避免决策失误(DeCoster和Strange, 1993)和利用信息溢出(Shaver等, 1997)等目的而模仿东道国已有外资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知识在空间邻近的企业集群中传播更快(Jaffe等, 1993),企业空间集聚可以相互学习并“加速思想流动”,而外资企业往往比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更高(Caves, 1974; 蒋殿春、鲁大宇, 2023),因此新进外资会倾向于向已有外资靠近而形成空间集聚。

上述研究多以单个来源国的外资企业为研究样本,而忽略了外资企业特有的来源国性质。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学者发现已有外资对新进外资的“示范效应”在同源国企业范围内更加明显(DeCoster和Strange, 1993)。Schroath等(1993)首次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同源国效应在中国存在的可能性,并得到了后续研究的验证(He, 2003; 韩剑等, 2005; 徐康宁、王剑, 2006; 颜银根, 2014)。新进入东道国的外资亟须快速获取东道国的本地信息与信任来在陌生市场站稳脚跟(Cuervo-Cazurra等, 2007; Tsui-Auch和Möllering, 2010; Johanson和Vahlne, 2017)。Lane和Lubatkin(1998)从跨国企业内部的信息交换出发,认为企业间需要通过信息交流来适应东道国环境。与国内公司相比,外国投资者更加缺乏当地知识,因此面临更高的信息搜寻成本(Lamin和Livianis, 2013)。而来源国别相同的公司信息交流水平相对更高,Chang和Park(2005)也发现隐性知识更容易在同一国家的企业间进行传播。另外,对当地合法性的快速获取也可以缓解外资企业初入东道国时所面临的“局外人”地位,同源国企业间的合法性外溢现象也会形成同源外资的空间集聚(Kostova和Zaheer, 1999)。Tan和Meyer(2011)通过研究越南的外资企业分布,进一步证实了外外国别集聚是为了共享当地知识与经验进而获取当地社会的信任。

尽管来源国别因素对外资企业在华投资选址的重要作用现已被普遍认同,但遗憾的是受限于数据可得性,现有文献均无法对海外投资的真实来源地进行识别与区分,因此目前关于外国别集聚的研究结论大多基于少部分省市或少数来源国的外资样本得出,仍存在研究尺度与全面性等方面的局限。为此,本文尝试使用精准识别外资来源的微观数据库来探究外资在城市内部的国别集聚问题。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将外资的国别集聚细化至城市内部的微观外资层面进行分析,扩展了已有关于外资集聚研究的边界并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现有文献多聚焦于宏观层面的外资流向问题。本文则使用更为全面的区分来源的外资注册数据库,重点讨论了来源国因素是否影响城市内部微观外资的空间分布,是对已有文献的有益补充。第二,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国别集聚的概念进行了扩充,首次探究了邻近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空间集聚的可能性,丰富了关于外资集聚的相关文献。第三,本文还探讨了国别集聚的独立存在性,并着重分析了外资国别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已有研究大多认为国别集聚与产业集聚密不可分,根据局部样本判断得出外资的国别集聚实际上是产业集聚的衍生现象。而本文则发现行业因素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资邻国集聚,但是在尽可能剔除行业关联后,外资的同源国集聚仍旧独立存在。这说明外资的国别集聚并非完全随着产业集聚出现,而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既是对已有研究的有益补充,也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各地在对外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应跳出产业集聚与行业关联的局限,注重外资的来源国别来发掘吸引外资的新优势,制定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外资招引政策,以此助力“引外资”和“稳外资”高质量发展。

## 二、特征事实与理论机制

### (一)特征事实

本文分别计算了美国和日本每一年所有来华投资选址点周边10公里范围内各国(或地区)<sup>①</sup>已有投资的平均次数及距各国已有投资企业的平均最短距离,通过图1可以对美国与日本每年新进入中国外资周边各国企业空间分布进行粗略了解。可以发现,美日两国新进外资距离本国已有投资更近并且周边本国已存企业更多,可以初步判断在华外资企业存在国别空间集聚倾向。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表示加拿大和日本的曲线均十分接近美国,这说明外资企业在中国城市内部的集聚可能并不仅限于本国,彼此之间关系更亲近的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也可能相互靠近。当然,这只是基于大量样本数据的简单推理,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更为严格的实证分析来支撑这些结论的可靠性。

### (二)理论分析

#### 1. 企业竞争劣势

母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初期面临着先天竞争劣势,Zaheer(1995)用“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LOF)来概括这种现象,此后诸多研究也通过实际数据分析证实了LOF的普遍存在性(任兵、郑莹,2012)。同源国家企业间的归属感相对更强,城市内部带有国别性质的外资企业空间集聚可以通过资源共享等途径帮助周边新进企业尽快摆脱局外人身份(Kostova和Zaheer,1999),弥补自身的部分劣势。此外,外资企业间的知识溢出存在“匹配度”与“同源性”,这意味着同源国

<sup>①</sup> 本文中的“国”均指“国家(或地区)”。

企业之间具有更多的技术合作与交流(颜银根,2014),新进外资会倾向于靠近本国已有企业来最大限度地接受此类正向外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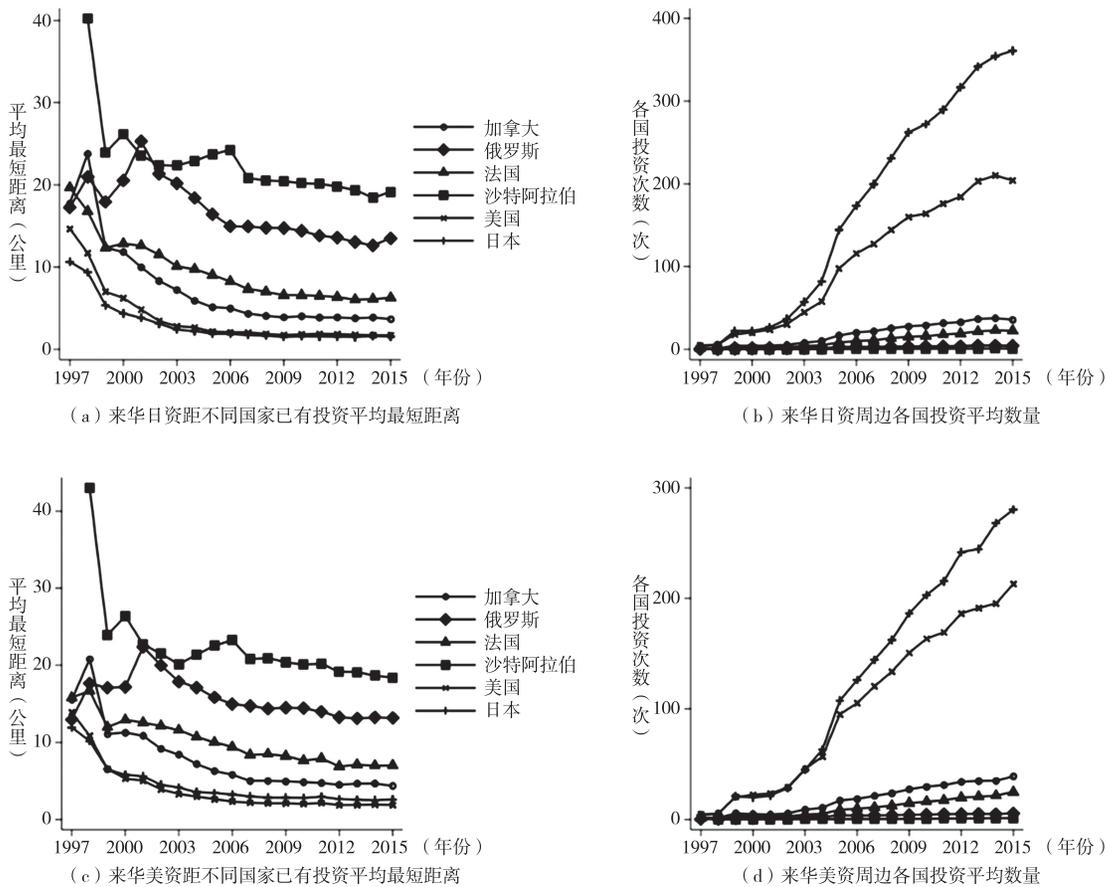


图1 日本、美国在华新投资周边各国企业空间分布情况

## 2. 国别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善意和信任基础上的个体关联,社会网络通过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增进同一网络参与者之间的合作行为(Uzzi和Lancaster,2003)。Zaheer等(2009)发现由民族纽带构建的社会网络所带来的知识溢出会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中国跨国企业也会通过基于民族的商业和社会网络来克服国际市场上的制度和信息障碍(Karreman等,2017)。新进入东道国的企业往往需要融入母国社会网络来获取知识、信息和相关经营建议(Tan和Meyer,2011)。

## 3. 合法性外溢

合法性问题直接影响对外投资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刘洪深等,2013),东道国政府可能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对外国企业实行政治歧视(Henisz和Williamson,1999)。此外,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后难以与当地供应商或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建立信任关系(Eden和Miller,2004),因此外资企业需要获取当地的合法性以降低其面临的歧视成本,尽快适应当地的“游戏规则”。Kostova和Zaheer(1999)发现来源于同一母国的企业可以在东道国实现合法性的正向外溢,Tan和Meyer(2011)进一步证实了外资企业国别集聚是为了获取当地社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因此,新

进外资需要尽可能靠近本国已形成的国别企业集群以获取合法性外溢,从而降低其早期经营难度。

### 三、数据说明及计量模型设定

####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来自我国商务部外商企业信息查询平台的外商直接投资注册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200余万条外资企业注册记录,包括1980—2018年所有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注册数据,这些外资企业囊括了常见的所有行业,基于此可以知晓每一笔在华外资的投资时间、投资地点、注册金额和投资来源地等数据。根据研究需求,本文截取了该原始数据库中1992—2018年的外商投资数据,为了精准识别出外资企业所隶属的行业,首先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罗列的条目产品拆分为行业关键词,再将外资企业注册数据库中的企业名称与行业关键词进行匹配,由此得出数据库中外资企业所属的行业大类,进而得到国家-城市-行业-年份-企业层面的数据。但是此种方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难度较大,主要是由于企业注册时选用名称的不规范带来了大量缩写或者无法识别行业的企业名,自此我们使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企业行业的匹配程度只能达到50%左右。对于未能成功匹配行业的企业名称,根据外资企业在工商企业数据库和“天眼查”网站上有注册地和行业所属分类的特征,本文增加了另外的识别方法:将外资企业注册数据库与工商企业数据库以及“天眼查”上抓取的企业信息相匹配,最终得到部分外资企业的所属行业。这一方法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原因在于某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工商企业数据库(或天眼查)中无备案信息,另外从工商企业数据库抓取的数据同样存在部分企业信息的缺失。最终,将两种方法相结合后,初始数据库中成功匹配到行业信息的外资企业达到总企业数量的90%以上,完全满足实证分析的需求。

考虑到服务业企业地理分布状态的独特性,本文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的行业划分剔除了归属于第三产业的外资样本。为了确保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定性,进一步剔除了中国香港、开曼群岛、百慕大、萨摩亚和英属维尔京等世界著名离岸金融中心的在华投资样本,并且剔除了部分在华投资次数极少的国家样本,最终得到本文所需要的外资在华注册总体样本。

#### (二)变量选取

#####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通过企业名称定位到其所属城市,接着调用多个国内地图软件的API对企业的精确地理坐标进行匹配,得到数据库中每一笔外资的经纬度信息。之后分城市对1993年开始每一笔新进外资与同一城市50公里内所有已存外商投资进行坐标匹配,并计算了新进外资与已存外资之间的直线距离,最终汇总了每一笔新进外资周边10公里内各国已存外资数量,取对数后最终得到年份-城市-企业-国家层面的指标 $\ln Number$ 作为被解释变量,数量越多代表新进外资在城市内与该国家已有外资的集聚倾向越高。

##### 2.解释变量

为了研究同源国效应是否带来城市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本文设置了企业-国家层面的虚拟变量 $Home$ , $Home$ 为1代表这一笔新进外资来源于该投资国, $Home$ 为0则代表这一笔新进外资来源于其他投资国。为了证明城市内部外资企业邻国集聚现象存在的可能性,本文还使用

CEPII引力模型数据库中两个国家间人口最多城市间加权距离的调和平均的对数作为国家距离的初步替代,得到企业-国家层面的变量  $\ln Distance$ , 表示一笔新进外资的投资国与对应国家的地理距离。

### 3. 控制变量

本文的实证结果对多个维度的因素进行了控制,主要包括:企业层面、城市层面、国家层面、行业层面以及多个交叉层面。企业层面我们控制了每个外资企业的规模,用每笔外资年度注册资本的对数来表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来源于手动整理后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包含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城市环境水平等地级市年度变量,分别以城市年度的总人口对数,人均GDP对数,二、三产业产出占比和园林绿地面积的对数来表示;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则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库(Penn World Table-version 10.0),本文使用其中的数据得到不同国家的总人口数量、真实人均GDP与国家出口份额,分别代表各国的整体规模、发展水平与对外开放水平;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使用行业关税水平,数据来源于WITS全球关税数据库,以该年度中国各行业的加权平均关税来表示,其中2012年和2013年缺失的关税数据使用WTO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库进行补充。在单维度的控制变量之外,本文还添加了交叉维度的控制变量,包括城市-国家维度的航线开通虚拟变量、城市-国家-行业维度的外资注册数量等。

### (三)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外资企业在中国城市内是否存在同源国集聚的现象,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ln Number_{ijct} = \alpha + \beta_1 Home_{ijct} + \gamma X_{ijct} + \lambd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jct} \quad (1)$$

其中, $i$ 表示每一笔新进外资, $c$ 代表该外资所在的城市, $t$ 表示外资 $i$ 的进入年份, $j$ 表示 $t$ 年之前在中国已经进行过投资的国家。被解释变量  $\ln Number_{ijct}$  表示在 $t$ 年国家 $j$ 在城市 $c$ 内所有现存外资中距新进外资 $i$ 在10公里范围内的投资数量的对数; $Home_{ijct}$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位于城市 $c$ 的外资 $i$ 的投资国是否为 $j$ 国的虚拟变量; $\lambda_i$ 和 $\lambda_t$ 分别是外资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 $X_{ijc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含企业、城市、国家、行业 and 多个交叉层面。 $\varepsilon_{ijct}$ 表示随机误差项。根据之前的分析,如果外资在中国城市内部存在同国别的集聚现象,则 $\beta_1$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 四、实证分析

###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1报告了基于模型(1)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6)列均控制了外资个体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并逐步加入企业、城市、国家、行业和交叉层面的控制变量。在第(1)~(6)列的回归结果中,是否同国这一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新进外资在城市内部周边本国已存企业相对更多,新进外资有向同国企业靠近的倾向,进而形成外资的同国别集聚现象,初步验证了本文的主要假设。

### (二)邻国效应与外资企业空间集聚

在同源国外资集聚之外,本文还尝试证明邻国外资集聚的存在。Tobler(1970)提出的“地理学第一定律”强调,距离越近的两个国家之间相关性越强。Fernandes和Tang(2014)发现邻国企业的出口行为会给本国企业提供东道国市场信号,邻国的出口与投资也会对本国后续投资起到引导作用。在获取当地信任方面,企业间隐性知识的传播与溢出也并不仅限于同源国家企业之间,Lane

和Lubatkin(1998)发现文化相似度更高的企业间相互学习能力也会更强。后续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来自相近社会背景与种族的投资者之间同样可以通过扎堆投资来更好地适应当地商业环境(Liker等,1999;Miller等,2008)。因此距离相近或者联系程度较高的国家间可能会出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邻国集聚现象。基于此分析,本文假定在同源国企业集聚之外,外资企业还可能存在着另一种国别集聚——邻国集聚,即彼此距离更靠近的母国在东道国所投资的企业也会相互靠近。

表1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5)	(6)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Home	2.558*** (0.184)	2.558*** (0.184)	2.576*** (0.186)	1.926*** (0.134)	1.949*** (0.137)	2.022*** (0.138)
企业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国家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行业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交叉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4475855	14475855	14241813	13424941	12749206	12194229
调整的R <sup>2</sup>	0.178	0.178	0.178	0.405	0.403	0.406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在城市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下同。

为进一步考察母国距离相近的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城市内部的投资是否同样存在空间集聚,本文对模型(1)进行了修改,得到模型(2)。与模型(1)相比,模型(2)的核心解释变量更换为 $Distance_{ijct}$ ,即城市 $c$ 内新进外资 $i$ 的投资国与 $j$ 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这里我们采用两个国家间人口最多城市间加权距离的调和平均的对数值来代表该变量。

$$\ln Number_{ijct} = \alpha + \beta_2 Distance_{ijct} + \gamma X_{ijct} + \lambda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jct} \quad (2)$$

表2是对模型(2)回归结果的展示,观测值大幅减少是因为将外资 $i$ 的投资国与 $j$ 是同一国家的样本进行了剔除,结果显示国家间距离的系数估计值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这表明国外的新进外资在中国城市内部会更接近邻近国家的已有外资,邻国效应也会带来城市内部的外资集聚现象。首先,距离更近的国家之间在多个层面上具有更高的相似度,而这种高相似度促使这些国家为了共享信息、适应环境等目的而集聚在一起;其次,已经在华进行过投资的国家可能在本国周围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对周边国家的投资选址产生影响,吸引邻国企业在自身已有企业附近进行落户,新进入中国的外商资本在投资选址时会更靠近母国邻近国家的已有投资。

### (三)异质性分析

#### 1. 投资国之间的差异

国家间发展水平的差异代表着产业结构、人才储备和投资动机等方面的不同,因此母国的发展情况可能是影响其对外投资选址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与投资国人均GDP水平的交互项放入模型(1)和模型(2)中进行回归。表3分别报告了加入交互项后模型(1)

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各维度的控制变量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华外资的同源集聚倾向没有显著差异,而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在华投资的邻国集聚倾向越低,发展较为落后国家的在华投资会表现出更强的邻国集聚倾向。

表 2 邻国外资集聚

变量	(1)	(2)	(3)	(4)	(5)	(6)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i>Distance</i>	-0.333*** (0.029)	-0.333*** (0.029)	-0.335*** (0.029)	-0.132*** (0.036)	-0.131*** (0.037)	-0.155*** (0.039)
企业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国家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行业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交叉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2145829	12145829	11948361	11376312	10792622	10317022
调整的 R <sup>2</sup>	0.136	0.136	0.136	0.378	0.375	0.379

表 3 投资国发展水平

变量	(1)	(2)	(3)	(4)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i>Home</i>	-7.269*** (1.935)	2.941 (2.354)		
<i>Distance</i>			-1.131*** (0.367)	-4.992*** (0.701)
交互项	0.933*** (0.185)	-0.087 (0.216)	0.076** (0.033)	0.457*** (0.065)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4437441	12194229	12129246	10317022
调整的 R <sup>2</sup>	0.180	0.406	0.136	0.384

## 2. 城市之间的差异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理区域的引资政策、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有必要对外资的落脚城市进行异质性分析。首先将中国的城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表4汇报了按城市位置进行分样本回归的结果。第(1)、(2)列的结果显示,地处东部地区城市的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且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这说明落脚在我国东部城市的外资企业在城市内部同时存在同国别集聚与邻国抱团集聚的现象。第(3)、(5)列的结果表明,在我国中西部城市落脚的外资同样存在显著的同国集聚现象,但是第(4)、(6)列的国家距离变量的系数符

号与基准结果相反并且显著性大幅下降,说明在我国中西部城市的外资不存在显著的邻国集聚现象。

表4 城市地理位置

变量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1)	(2)	(3)	(4)	(5)	(6)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Home	2.112*** (0.134)		0.710*** (0.0695)		0.690*** (0.0903)	
Distance		-0.159*** (0.041)		-0.057 (0.038)		0.004 (0.03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843411	10039123	251466	199598	99352	78301
调整的R <sup>2</sup>	0.408	0.381	0.390	0.376	0.353	0.330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在我国进行投资的外国企业通常把总部设置在发展水平更高的东部,并且在这些大城市内部密集地设置子公司与分公司,这时外资企业的国别集聚会显著地带来信息互通、成本降低和劳动力共享等优势;但是中西部地区的外资则多为仅承担生产性业务的部门,上述国别集聚利益的减弱使得邻国集中现象减少甚至消失。

### 3. 外资规模与国别集聚

张会清和王剑(2011)研究发现,除投资目的地区位条件外,外资企业间规模差异也会对其空间集聚造成异质性影响。首先,我们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外资注册金额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其次,进一步考虑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相互集聚的情况,按照投资金额的中位数对外资规模进行划分并计算新进大小外资企业周边不同规模企业的数量。表5第(1)、(2)列的结果显示,投资的金额大小并不影响外资的同源集聚倾向,但是国家间距离和投资规模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规模越小的外资企业在选址时会越倾向于靠近邻国已有企业,而新进入大企业的集聚倾向相对更弱。第(3)~(6)列的结果表明新进入的小企业向已存大企业的邻国集聚倾向显著,而新进入大企业则不会考虑靠近邻国已有的小企业。

表5 外资规模差异

变量	企业规模调节		小企业向大企业集聚		大企业向小企业集聚	
	(1)	(2)	(3)	(4)	(5)	(6)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Home	2.022*** (0.138)		1.009*** (0.153)		1.403*** (0.108)	
Distance		-0.156*** (0.039)		-0.107** (0.045)		-0.028 (0.036)
交互项	-0.012 (0.016)	0.015*** (0.0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续表 5

变量	企业规模调节		小企业向大企业集聚		大企业向小企业集聚	
	(1)	(2)	(3)	(4)	(5)	(6)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2194229	10317022	1648778	1342329	2445093	2004978
调整的 R <sup>2</sup>	0.406	0.380	0.373	0.359	0.381	0.367

(四)稳健性检验

1. 更换变量测度方式<sup>①</sup>

第一,基准回归中本文基于企业密度衡量了外资的国别集聚倾向,接下来将从企业分布距离的视角出发,采用企业-国家最短距离 *MinDist* 来代替企业数量。为了得到这一替代被解释变量,本文将初始样本按照数据处理部分进行企业之间的配对后,分国家计算每一个新进企业周边各国已存外资的最短距离,得到年份-城市-企业-国家层面的外企距离结果。此时如果城市内部的外资国别集聚仍旧存在,则新进外资距离同一城市内同国或邻国的外商投资相对更近。第二,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结论,我们还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更换了核心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首先将是否同国这一虚拟变量用国家间是否使用同一官方语言和是否有至少9%的人口使用同一语言来替代,接着更换距离指标为两国首都距离和两个国家间人口最多城市间加权距离的算术平均。

2. 国别效应独立性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的选址还会受到各地招商引资政策及周边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等因素的影响。为了证实外资企业在城市内部的空间集聚并非完全由政策或产业因素引致,我们首先尝试剔除开发区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外资样本,对外资的国别集聚独立性进行检验。<sup>②</sup>表6第(1)和(2)列、第(3)和(4)列分别汇报了剔除各开发区10公里和15公里范围内外资样本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符号均与基准结果一致且十分显著,这说明外资的国别集聚并非完全是开发区等区位政策所带来的结果。

表 6 排除开发区影响

变量	10公里范围		15公里范围	
	(1)	(2)	(3)	(4)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i>Home</i>	1.778*** (0.123)		1.569*** (0.162)	
<i>Distance</i>		-0.136*** (0.025)		-0.129*** (0.03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275813	1931606	735183	616929
调整的 R <sup>2</sup>	0.452	0.433	0.315	0.268

① 限于篇幅,正文未展示更换变量测度方式后的回归结果,留存备案。

② 限于篇幅,具体开发区周边企业识别方法未在文中详细说明,留存备案。

本文异质性部分对多个维度可能存在的差异进行了探讨,但没有考虑到外资间的行业关联是否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为探究外资的国别集聚是否与行业因素相关,将原始数据的国民行业分类与投入产出表的42部门行业分类进行手动匹配,并根据关大博教授团队编制的地级城市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不同城市内部各行业间的关联度(Zheng等,2022)。参照潘文卿等(2011)的方法,将产业*i*和产业*j*的关联度定义为两产业之间直接消耗系数结构向量的角余弦,并根据产业间关联度的分位数将产业对划分为高关联产业对和低关联产业对。<sup>①</sup>表7的第(1)和(2)列、第(3)和(4)列、第(5)和(6)列分别展示了仅保留同产业样本、高关联度产业样本和低关联度样本的回归结果。第(1)、(3)和(5)列表明企业向上下游已有企业集聚的同源集聚倾向均显著,说明外资的同源国集聚独立于产业集聚而存在。从第(2)和(4)列可以看到,新进外资会显著靠近已存在的高关联度产业邻国外资,第(6)列表明新进外资向已存低关联行业邻国外资的集聚倾向不显著,外资的邻国集聚可能与产业集聚相关。

表7 产业关联与国别集聚

变量	同行业		高关联行业		低关联行业	
	(1)	(2)	(3)	(4)	(5)	(6)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i>Home</i>	0.957*** (0.108)		1.253*** (0.111)		0.007*** (0.003)	
<i>Distance</i>		-0.082** (0.037)		-0.083** (0.037)		0.000 (0.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790575	2895058	4943585	3846599	6102861	4824531
调整的R <sup>2</sup>	0.374	0.390	0.440	0.456	0.155	0.157

### 3. 内生性问题

由于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同国的虚拟变量以及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因此基准模型的内生性主要来源于遗漏变量问题。

为了缓解这一内生性问题,首先在基准估计方程中进一步添加了更为严格的交互固定效应,结果如表8第(1)~(6)列所示,在分别控制了城市与年份、国家与年份以及行业与年份的交叉固定效应后,本文主要结论依旧稳健。此外,我们还试图通过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使用两国历史关联度作为工具变量,由两国是否被同一宗主国殖民来代表。一方面,两个国家是否被同一个宗主国殖民与它们之间的地理距离高度相关,故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随着大部分国家独立后长时间的发展,被共同殖民的经历并不会影响到它们在中国投资的位置关系,该工具变量也基本满足排他性要求。表8第(7)列展示了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通过Kleibergen-Paaprk的LM统计量和Wald F统计量等可以判断该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弱识别和过度识别问题,且结论仍与前文一致。

<sup>①</sup> 限于篇幅,产业关联度的计算公式未在文中详细说明,留存备索。

(五)机制检验

1.外来者劣势

根据前文分析,国别效应可能通过缓解新进外资的外来者竞争劣势来影响外资空间分布。本文使用CEPII数据库,参照马述忠等(2024)的做法,用与中国的共同宗教指数(CRI)来代表投资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反映投资国在中国的外来者劣势水平,并在原有模型中加入CRI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乘项。表9第(1)、(2)列的回归结果说明,劣势越明显的投资国在中国城市内部距离本国企业与邻国企业越近,结合前文企业规模调节的结果,可以证实新进外资企业为了应对外来者竞争劣势而在城市内寻求国别集聚。

表8 内生性问题

变量	交叉固定效应						IV
	(1)	(2)	(3)	(4)	(5)	(6)	(7)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Home	2.023*** (0.138)		2.022*** (0.138)		2.022*** (0.138)		
Distance		-0.155*** (0.039)		-0.154*** (0.039)		-0.155*** (0.039)	-1.021*** (0.28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母国-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KP rk LM							15.20 [0.000]
KP rk Wald F							78.48 {16.38}
观测值	12194185	10316973	12194229	10317022	12194229	10317022	10317022
调整的R <sup>2</sup>	0.406	0.380	0.406	0.380	0.406	0.380	0.144

注:[ ]内数值为P值,{}内数值为Stock-Yogo弱识别检验在10%水平下的临界值。

表9 机制检验

变量	外来者劣势		国别社会网络		合法性溢出	
	(1)	(2)	(3)	(4)	(5)	(6)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lnNumber
Home	2.201*** (0.147)		1.791*** (0.117)		1.840*** (0.114)	
Distance		-0.171*** (0.042)		-0.074** (0.037)		-0.127*** (0.025)
交互项	-293.488*** (38.612)	48.221*** (12.675)	0.019*** (0.006)	-0.007*** (0.002)	1.111* (0.604)	-0.163 (0.17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1543073	10317022	12194229	10317022	12194229	10317022
调整的R <sup>2</sup>	0.409	0.380	0.409	0.388	0.407	0.380

## 2. 国别社会网络

为探讨社会网络的构建是否会促进外资的国别集聚,我们使用国际民航组织(ICAO)统计的航线数据,计算出了每个投资国与我国各城市的年度航班数量来代表由人员流动带来的社会网络建设水平。表9第(3)、(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网络的构建会显著提升外资在城市内部的国别集聚倾向,证实了国别社会网络对外资集聚的促进作用。

## 3. 合法性溢出

外商直接投资合法性劣势来源于企业与东道国制度环境之间的不兼容性和意识形态冲突(吴波等,2022)。驻外使领馆对驻在国经济发展、市场需求、经贸法规、投资环境、企业活动等情况较为熟悉(郭昕炜、陈丰龙,2014),作为官方机构可以为当地本国企业提供合法性支持,促进本国企业的合法性外溢。我们设立年份-城市-国别的虚拟变量来表示各国不同时期在中国设立领事馆的情况,并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其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表9第(5)、(6)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城市设立投资国的领事馆之后,投资国在城市内部的外资集聚同国倾向会增加,而对邻国集聚则没有调节效应。这说明合法性外溢的增加会致使企业更多地寻求向本国已有投资集聚,而邻国之间的合法性外溢水平较低。

##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使用我国微观层面的外资注册数据,通过计算新进外资一定范围内对应国家的外资密度,探究了外资企业在中国城市内部国别集聚的存在性与其内在机制。本文的结果表明,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城市内部选址时会更倾向于靠近本国已有企业,外资国别集聚在我国城市内部的存在性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本文还发现在同源国外资企业集聚之外,邻国外资空间集聚同样存在于我国城市内部。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发展程度越高、投资于我国东部城市和自身规模越小的企业,越倾向于向同源已有外资集聚。

本文还进一步探究了外资国别集聚的内在机制。通过对外资行业的识别及行业关联度的计算,在尽可能剔除行业关联因素后,研究结果证实同源国别集聚并非产业集聚的衍生品,行业关联度低的同源外资同样存在显著的集聚倾向,外资的国别集聚独立于产业集聚而存在,而邻国集聚则具有一定的产业关联属性。首先,本国企业的集聚可以带来语言劳动力的共享,也可以促成知识和信息等隐性要素的传播,缓解新进外资的外来者劣势。其次,直达航线等公共服务的完善可以促进投资国在当地社会网络的构建,增加外资的集聚倾向。最后,外资的集聚可以带来合法性外溢,投资者为获取投资地的信任而向本国企业更密集的地区进行投资。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含义如下。第一,应适当考虑根据来源地规划产业园区。目前我国涉国别的产业园区数量较少,可鼓励有相关条件的城市将存在特定国别企业基础的区县或工业园区发展成为有来源地特色的产业聚集区。在来源地特色园区规划建设时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重视与特定来源地及来源地相邻国家地区的产业链关联关系。第二,根据外资来源地特征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在明确本地存在有特色的外资来源地集聚的基础上,可根据来源地的习俗与文化习惯来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鼓励同来源地企业建立跨行业的国别商会并积极促成本地与特定来源地开通直飞航班或设置便捷的航班中转方案。为增进各国之间的了解,各地可考虑与来源地达成友好城市。有针对性地举办国际文化节,增强外籍人士在华生活的舒适感,同时利用中国逐步放开的免签政策大力吸引外国人士来华参观旅游,通过这些政策增加各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以及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信心,从而增加其来华投资意愿。第三,重视跨国

人才队伍建设。针对外资企业的服务不仅需要培养熟悉外语的人才,还需要这些人才具备跨文化沟通和企业经营管理的能力,需要根据本地外资国别集聚特征加强外语经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陈榕景、铁瑛:《跟着邻居去出口?——邻居出口信号、不确定性与出口目的地本土集聚》,《国际贸易问题》2022年第1期。
2. 冯涛、赵会玉、杜苗苗:《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域集聚非均衡性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2期。
3. 郭昕炜、陈丰龙:《驻外使领馆是否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4期。
4. 韩剑、潘沁、徐康宁:《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集聚效应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3期。
5. 蒋殿春、鲁大字:《外资自由化与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中间品市场的新发现》,《南开经济研究》2023年第5期。
6. 刘洪深、汪涛、周玲、苏晨汀:《制度压力、合理性营销战略与国际化企业绩效——东道国受众多元性和企业外部依赖性的调节作用》,《南开管理评论》2013年第5期。
7. 马述忠、吴鹏、房超:《国际海底光缆、双边信息流与中国跨境并购》,《世界经济》2024年第4期。
8. 潘文卿、李子奈、刘强:《中国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35个工业部门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11年第7期。
9. 任兵、郑莹:《外来者劣势研究前沿探析与未来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年第2期。
10. 盛丹、张国峰:《两控区环境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管理世界》2019年第2期。
11. 吴波、杨步韵、杨燕:《中国国企跨国并购的合法性劣势及破解路径——基于制度组态的定性比较分析》,《经济管理》2022年第12期。
12. 徐康宁、王剑:《外商直接投资地理性聚集的国(地区)别效应:江苏例证》,《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2期。
13. 颜银根:《FDI区位选择:市场潜能、地理集聚与同源国效应》,《财贸经济》2014年第9期。
14. 张会清、王剑:《企业规模、市场能力与FDI地区聚集——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管理世界》2011年第1期。
15. Arauzo Carod, J. M., Determinants of Industrial Location: An Application for Catalan Municipalities.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Vol.84, No.1, 2005, pp. 105–120.
16. Audretsch, D. B., & Feldman, M. P., R&D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6, No.6, 1996, pp. 630–640.
17. Caves, R. E., Causes of Direct Investment: Foreign Firms' Shares in Canadian and United Kingdom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56, No.3, 1974, pp. 279–293.
18. Chang, S., & Park, S., Types of Firms Generating Network Externalities and MNCs' Co-location Decision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6, No.7, 2005, pp.595–615.
19. Cuervo-Cazurra, A., Maloney, M. M., & Manrakhan, S., Causes of the Difficultie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38, No.5, 2007, pp. 709–725.
20. DeCoster, G. P., & Strange, W. C., Spurious Agglomer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33, No.3, 1993, pp. 273–304.
21. Eden, L., & Miller, S. R., *Distance Matters: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Ownership Strateg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22. Ellison, G., & Glaeser, E. L.,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y: Does Natural Advantage Explain Agglome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9, No.2, 1999, pp. 311–316.
23. Fernandes, A. P., & Tang, H., Learning to Export from Neighbo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94, No.1, 2014, pp. 67–84.
24. Foster, A. D., & Rosenzweig, M. R., Microeconomics of Technology Adoption.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Vol.2, No.1, 2010, pp.395–424.
25. He, C., Location of Foreign Manufacturers in China: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Country of Origin Effects.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Vol.82, No.3, 2003, pp.351.
26. Head, C. K., Ries, J. C., & Swenson, D. L., Attracting Foreign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Promotion and Agglome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29, No.2, 1999, pp. 197–218.
27. Head, K., & Ries, J., Inter-city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Investment: Static and Dynamic Effects of China's Incentive

- Area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40, No.1, 1996, pp. 38–60.
28. Head, K., Ries, J., & Swenson, D., Agglomeration Benefits and Lo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38, No.3, 1995, pp. 223–247.
29. Henderson, V., Externaliti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42, No.3, 1997, pp. 449–470.
30. Henisz, W. J., & Williamson, O. E., 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within and between Countries. *Business and Politics*, Vol.1, No.3, 1999, pp. 261–277.
31. Jaffe, A. B., Trajtenberg, M., & Henderson, R., 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as Evidenced by Patent Cita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8, No.3, 1993, pp. 577–598.
32. Johanson, J., & Vahlne, J. 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outledge, 2017.
33. Karreman, B., Burger, M. J., & Van Oort, F. G.,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Europe: The Role of Overseas Communities. *Economic Geography*, Vol.93, No.2, 2017, pp. 131–161.
34. Kostova, T., & Zaheer, S., 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 Under Conditions of Complexity: The Cas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24, No.1, 1999, pp. 64–81.
35.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9, No.3, 1991, pp. 483–499.
36. Lamin, A., & Livanis, G., Agglomeration, Catch-up and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i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3, Vol.44, 2013, pp.579–606.
37. Lane, P. J., & Lubatkin, M., Relative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19, No.5, 1998, pp. 461–477.
38. Liker, J. K., Fruin, W. M., & Adler, P. S. (Eds.), *Remade in America: Transplanting and Transforming Japanese Management Systems*.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9. Miller, S. R., Thomas, D. E., Eden, L., & Hitt, M., Knee Deep in the Big Muddy: The Survival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in Developed Markets.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48, No.6, 2008, pp. 645–666.
40. Shaver, J. M., & Flyer, 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Firm Heterogenei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1, No.12, 2000, pp. 1175–1193.
41. Rosenthal, S. S., & Strange, W. C., The Determinants of Agglomeratio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50, No.2, 2001, pp.191–229.
42. Saxenian, A.,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43. Schroath, F., Hu, M., & Chen, H., Country-of-Origin Effects of Foreign Investme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24, No.2, 1993, pp. 277–290.
44. Shaver, J. M., Mitchell, W., & Yeung, B., The Effect of Own-Firm and Other-Firm Experienc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urv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7–92.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18, No.10, 1997, pp. 811–824.
45. Tan, D., & Meyer, K. E., Country-of-origin and Industry FDI Agglomeration of Foreign Investors in an Emerging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42, No.4, 2011, pp. 504–520.
46. Tobler, W. R., A Computer Movie Simulating Urban Growth in the Detroit Region. *Economic Geography*, Vol.46, No.1, 1970, pp. 234–240.
47. Tsui-Auch, L. S., & Möllering, G., Wary Managers Unfavorable Environments, Perceived Vulnera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ust in Foreign Enterprises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41, No.6, 2010, pp.1016–1035.
48. Uzzi, B., & Lancaster, R.,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Learning: The Case of Bank Loan Managers and Their Clients. *Management Science*, Vol.49, No.4, 2003, pp. 383–399.
49. Zaheer, S., 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38, No.2, 1995, pp. 341–363.
50. Zaheer, S., Lamin, A., & Subramani, M., Cluster Capabilities or Ethnic Ties? Location Choice by Foreign and Domestic Entrants in the Services Offshoring Industry in Ind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40, 2009, pp. 944–968.
51. Zheng, H., Többsen, J., Dietzenbacher, E., Moran, D., Meng, J., Wang, D., Guan, D., Entropy-based Chinese City-level MRIO Table Framework.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Vol.34, No.4, 2022, pp. 519–544.

## Country-of-Origin Agglomeration in the Economy: Evidence from the Locations of FDI Firms

MA Yeqing, QIN Xianghui, LU Jian (Nanjing University, 210093)

**Summary:**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largely focuses on local factors, often overlooking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origin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external factors impact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examines the country-specific agglomer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within the same city. Motivated by reflections on foreign investment's location strategi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in host countries ami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is paper uses geographic coordinates data of newly registered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in China from 1992 to 2018 to explore these questions. Empirical analysis confirms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source country on the clustering of new foreign investments within cities, and the tendency of new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to locate closer to existing investments from the same source country in intra-city China.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in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study also finds a phenomenon of neighboring-country agglomeration of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within citi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uggests that country-specific agglomer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in cities with a lower level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maller investment sizes, and investments in eastern China. Mechanism analysis finds that country-specific effects influence foreign investment locations by mitigating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s, fostering social networks, and creating legitimacy spillover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is paper extends the analysis of country-specific FDI agglomeration to the firm level within cities, offer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FDI agglomeration. Second, this paper expands the concept of country-specific agglomeration by introducing the possibility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FDI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enriching the FDI agglomeration literature. Third,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country-specific agglomeration exists independently of industry-specific agglomeration. While earlier studies often link the two phenomena, concluding that country-specific agglomeration derives from industry-specific agglomeration based on the judgment of local sampl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industry factors may affect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agglomer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 homeland country agglomeration persists independently after removing the industry correl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This distinction highlights the independence of country-specific agglomer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which is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has clear policy implications. In the future, we will continue to conduct mor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service sector and its broader economic impacts.

**Key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 Choice, Country-of-Origin Agglomeration

**JEL:** F21, F23, R39

责任编辑:原 宏